

第六章 鼎革之际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在很多书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因而没有必要于此再作赘述。我只想就自己在北京的亲身经历，对当时发生的事件，略作记述和评论。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北京措手不及。当时清廷主政者，多系平庸低能之辈，且无经验。监管国事的摄政王载沣，虽意图良美，但生性软弱。庆亲王奕劻具有丰富的经验，可惜年事已高。协理大臣那桐，富有才华，能言善辩，却缺乏实际本领和决断才能。唯有镇国公载泽，在满族大臣中堪称果决勇毅之人。另一位满族大臣荫昌，曾留学德国，担任过驻柏林钦使，然而举止轻浮，常以开玩笑掩盖其浅薄，即在公众场合也喧闹嬉戏，不成体统。

汉族协理大臣徐世昌，曾任东三省总督，后来民国时任过总统，是学者型的政治家。他虽富有才能和经验，却不免被首揆和同僚所掣肘。另外两位汉人大臣梁敦彦和盛宣怀，也情况相同。他们满腹经纶，老于世故，但面对只有打过仗的人才能应付的局面，就显得体魄不够强健、气势不能夺人了。清廷大臣不是宿命论者，就是失败主义者，早已外强中干，色厉而内荏。烽火未起，官员们已准备投降了。更何况既不了解各省实情，又久未经历战事，因此，他们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

讨论如何应付局势的会议开了一个又一个，但总以拿不出任何对策而结束。绝望无助的情绪笼罩着群臣。清廷内阁从来没有

像这样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在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想到了三年前被贬回河南的袁世凯。尽管此人并不讨人喜欢,但清朝统治者尚能从理智上认识到,只有请袁世凯出山,才能控制局势。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四天,清廷颁布上谕,以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接替临阵脱逃的瑞徵。同日,还补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他以耿介忠诚见信于清廷。但是,袁世凯决计在其旧属尚未被恢复在京师的官职和未制定出一个成熟的出山计划前,暂不接受清廷的授职。10天后,清室再颁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其节制调遣,他依然无动于衷,没有接受朝旨的任何表示。

在北京,唐绍仪再度被授为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因在推行铁路国有化时,举措失当,而被免职。鉴于革命在各省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湖北,一个又一个地区落入革命军之手,清廷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开赴汉口,这一愚蠢的举动使得陆军部无人主持。武昌起义一个月后,袁世凯完全恢复了以前的地位,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接替庆亲王奕劻执掌朝政。直到两周后,前方军事形势大有转机之时,他才来到北京。此时的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恐怕也是有清以来权力最大的大臣了。

袁世凯抵达北京后,满朝文武,人心顿形安定,仿佛又恢复了元气。这充分显示出主政有方、处事果断的袁世凯在朝中所享有的不一般的威望。此前的京师则是一片恐慌,群臣犹如惊弓之鸟,神经质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一天,外务部的高级官员正在讨论严峻的时局,当时,来自各省的报告充斥着谣言,或夸大其词。恰在此时,部内主管电报的司员冲进门来,只见他面如土色,声称已无法收到天津总督衙门的回电(当时正在盛传革命党计划攻打天

津)。与会的各官员惊恐万状,纷纷喝令,立即乘车,马上回家。几分钟后,那位司员又来稟报,与天津的电报联络已经恢复,刚才无人作答,实因电报员正在如厕。

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中铸成了一个大错,它未制订充分的防范条款,就指令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保管全部关税收人。按照旧例,由英国人出任总税务司的海关虽然俨然已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但其职权仅限于收税,而且税款收后,必须立即交给称作道台(后来称海关监督)的中国官员,由他们负责保管。武昌起义后,一些道台已弃职逃跑,还有些人被革命军免了职,清政府急于重新任命一些人,接替他们。当时的关税收人大部分都用于分期偿付“庚子赔款”及其转化的外债和利息。在行将垮台之时,清政府竟然把原来道台拥有的权力,也拱手交给了英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

此后,中国政府失去了对这项主要税源的掌握权,在很长一个时期,反而受控于总税务司。英国人攫夺了许多权力,包括可任意决定巨额税款存放的银行;毫无疑问,中国银行绝对享受不到这种特权。从前来自海关罚款和吨位税的钱,历来都用作我国驻外使、领馆的经费,此后,也悉被总税务司席卷而去,用于支付赔款和外债,英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俨然成为中国财政部门的第二号人物。后来,他的权力进一步扩大,甚至把持了中国政府公债的发行偿付。所有这些恶果的造成,清政府难辞其咎。

新内阁在袁世凯抵京三天后宣布成立,其中包括几位他旧时的下属和同僚,如梁敦彦(外交)、赵秉钧(民政)、严修(度支)、王士珍(陆军)、萨镇冰(海军)等。内阁中惟一位满族人达寿担任理藩大臣。随后数周内,事态发展很快。四川省宣布独立,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满族)被杀。各省都督府公推武昌政府为中

央政府。外蒙古库伦也宣告独立。民军攻占南京。

不久，南北两军宣布停战，初以三日为期，后又再延三日。此间，惊人的消息接踵而来，摄政王载沣引咎辞职，唐绍仪被命为全权代表，与革命阵营议和。因此，休战日期又延长十五天，后再延七天。和议在上海举行，伍廷芳等人代表南方。

此时，孙中山博士从海外归来。在南京召开的十七省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他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于同日正式采用公历，以五色旗为国旗。3日，临时政府在南京组成，成立了新内阁；同日，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显然，除了军事斗争外，南北方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开始了，双方都希望取得有利地位。因使命惟艰，唐绍仪辞去全权代表身份。袁世凯通知伍廷芳，进一步的谈判直接由他们二人用电报进行。他可能对其代表并不十分满意，决定自己亲自参加和议。

作为清政府外务部的参议，我受命陪同袁世凯造访驻京各国外交官，特别是那些英语国家的使节。这使我有机会接近并观察袁世凯这个人。尽管我与他有着一层姻亲关系^①，此前却素昧平生。袁世凯身材不高，但长得较粗壮，令人感到他是一个果断、精力充沛的人。按照民间观相家的说法，这样的体格属“虎型”。他的头很大，双目炯炯有神；动作虽有些迟缓，但有条不紊。他总是闲不住，难得有静处之时。他的密友曾告诉我，在办公室里，哪怕只有几分钟的闲暇，他也要设法来打发，或整理桌上卷宗，或重新摆放文具。然而，他却不喜欢锻炼身体。他住一座很大的中式宅院里，寝室在后院。因须陪同他去东交民巷，我去过他的宅邸。

^① 袁世凯的第七子袁克齐娶孙宝琦之女为妻。——译者

我亲眼见到，即使是从后院至大门这么短的距离，他也要乘肩舆，从不走路。后来，他移居外务部新址，上下楼也必坐肩舆。

看来中西有关养生之道的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主张锻炼，以增强体魄。中国却认为，保持元气以少动为佳。但不管怎样，袁世凯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人。一次在从宫廷返回宅邸的路上，经过东华门时，附近的茶楼上突然扔出一枚炸弹，击中路旁的消防水龙头，擦过他乘坐的马车。袁世凯面不改色，继续驱车疾行。令人称奇的是，他的马车竟安然抵家，两匹马中，有一匹终因被弹片击中，倒地而毙。中国有句谚语讲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对袁世凯来说，倒有几分灵验。

经此意外，袁世凯再也不去上朝了。但是，总有一些内阁成员代替他每天向心地善良、头脑简单的隆裕太后奏报形势。他们从政治、军事两方面竭力地把局势说得严峻、无望，为的是使她做好精神准备，等待更糟糕事情的到来。特别是，当她质问为什么掌握有全部军队的内阁不采取军事行动镇压革命时，他们总是推托道：“国库空虚，饷糈匮乏，兵马不发。”于是，皇室不得不一再地拿出窖藏金银，交给度支部大臣，向银号钱庄兑换现款。

然而，袁世凯这边依然未见任何军事行动。据说，紫禁城内某处庭院，埋藏着大量的钱财（有关埋藏地点的图纸，由一位外国顾问收藏着。他收集有大量的中文书籍、地图和手稿），庚子年间，甚至连专事搜掠的八国联军都没有找到它们。此时，人们又试图发掘这些财宝，但其藏处依旧是个谜。总之，隆裕太后几乎把大部分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可还是无济于事。许多京师旧臣对这种卑劣的勒索非常愤慨。

与此同时，为了打破南北和谈陷入的僵局，有关人士还采取了

一定的措施,以逼使隆裕太后同意清帝逊位。中国驻外使节和47位北方军队的主要将领,先后奏请清廷,强烈要求实行共和体制,使国家避免陷入流血冲突。

1912年2月12日,幼帝溥仪正式退位,从此结束了清王朝268年的统治。三位满族大臣在逊位诏书上签字,其中两位是代替拒绝就职的汉族大臣的。退位诏书的措辞是由南方提供的,袁世凯的秘书处在诏书中加进了这样一句话:“即由袁世凯全权组织共和临时政府。”由于诏书出自一位著名学者型政治家^①的手笔,其措辞完全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和心态。诏书是这样结尾的:“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所谓“优礼”,当然指民国所同意的“优待皇室条件”。在劝说隆裕太后同意清帝退位的过程中,赵秉钧、胡维德和梁士诒等三位大臣发挥的作用最大。梁士诒当时正署理邮传部大臣。

据说,袁世凯当时主张君主立宪。可是,与南方关系密切、赞同美国民主政治的唐绍仪强烈主张实行共和政体,并竭力劝说袁世凯同意。还有一些满族大员,诸如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军咨使良弼等,则力主用武力镇压起义,但他们毕竟是极少数,发出的声音没有任何力量。占压倒优势的大多数人,都同意和平解决南北争端,并相信共和政体对中国来说,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

袁世凯在天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容闳当年率往美国的留学生有不少曾在其麾下供事;当他重握权柄后,自然要争取这些人对他的支持。唐绍仪和梁敦彦已在上文提到。此外,还有蔡

^① 此退位诏书系胡汉民请张謇所拟,电告袁世凯请发布。——译者

绍基和蔡廷干^①。蔡廷干后来实际上成为袁世凯的非正式助手，因而与外国人很熟。蔡绍基在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时，即被任命为外务部左丞，因为他是袁氏的亲信。然而，蔡绍基对当时事态的发展另有看法，又非常怀念舒适幸福的家庭生活（他在天津有一座宽敞的公寓），因此，他于民国成立之际，突然不辞而别，并拒绝再返北京。我于是连升两级，接替他担任左丞，后又晋升为外务部次长。

在清王朝最后的日子中，袁世凯把很多海外留学生集合在他周围，其中包括一些留学日本的人，他们的建议尤为他所重视，对他的帮助很大。每天，袁世凯都与他的智囊团共同进餐，很多重要的决策就是在饭桌上作出的。在混乱的局势中，他面临着许多非常棘手的问题：敷衍皇室和不妥协的激进派，结束战事，避免与外国发生纠葛，争取赢得列强的支持，特别是在财政方面。他必须策划出将来的立法和行政举措；创造一套共和政体的表达术语，以代替旧王朝的用语。他要选择并任命数以百计的新人，填补空缺职位，特别是在各省，因为各地不但有官员弃职逃走，也有自行选举上任的新官。他必须设计新的制服，颁布不同政府部门的服饰规定。最后，他还须制定行政级别制度，对各个级别给予适当的称谓。所幸的是，凭借着他在国内外长期任职取得的非同一般的经验，依靠着数以千计的文武官员、幕僚对他的支持（这些人在他编练新建陆军、任巡抚总督、内阁大臣时，都曾先后是他的部下），他完全可以应对这些问题。袁是当时中国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虽然他后来抛弃了共和观念，但人们不应忘记，他完全是一个

① 蔡绍基系容闳率领赴美留学的第一批幼生，蔡廷干为第二批幼生。——译者

出自旧中国历史背景、并且受其支配的人，况且，聚集在他周围的一群专事谄媚的食客。他恢复帝制，当起了封建王朝的皇帝，成为历史的罪人，对于这些愚蠢的妄为，那些食客应该说难辞其咎。

为了急于迎合共和形式，并且为了尽可能抢在激进派前面，袁世凯把“大臣”的称谓改成“首领”，相当于英语中的 Chieftain。这样的称呼不免显得粗俗，起码是不雅。袁世凯将自己称为临时政府元首，即最高首领。当时发生的另外两件有趣的事是剃发和易服。理发匠、裁缝乃至皮鞋匠的生意顿时兴隆起来。由于不知怎样梳分头，一些剪掉辫子的人索性把头发全部剃光，犹如寺庙中的和尚。至于服饰，也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搭配：有人穿着西式晨礼服，却戴着便帽；有人在晚礼服内衬上皮里（由于北京天气寒冷）；还有人穿晚礼服，却配上直条纹的呢裤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奇特的现象，恰恰反映了社会思潮和走向，即除旧布新，因此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尽管其中不乏有为衣食计者，但保守主义和顽固守旧派的围墙已被打破，这给改革和现代化运动带来了强劲动力。简言之，中国人民作为整体，已背对过去，勇敢地面向未定的将来；他们在新的环境中虽然步履蹒跚，却充满了希望。

清帝退位后，那些知名的、胆小的满族官员，包括一些皇族，纷纷迁居到大连和天津，在租界地寻求庇护所。一些汉族官员，在鼎革之际也惶惶不可终日，举家搬往时为德国租界地的青岛。下层八旗官员或无力离开北京，或不愿放弃他们的职位，便匆忙改用汉姓，伪称汉族，以避免麻烦。实际上，除了南方少数有驻防旗人的地方由于满汉居民交恶，有小范围残杀外，满族人并未受到粗暴对待，甚至未受到歧视。这不仅因为当时有关于满族待遇条件的明文规定，也由于“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前一日，孙中山大公无私地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当时的参议院由17个省的代表组成。黎元洪重新当选为副总统。

随后，几位著名代表离开南京，前往北京迎接新当选的临时大总统赴南方就任。就在这些代表等候袁世凯启行时，2月29日晚，北京爆发了一场神秘的严重骚乱。曹锟（曹锟于12年后，也就是1924年当上总统）率领第三师发动了兵变。这支军队是在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时调驻北京的。人们窃窃私议，认为兵变是由上面指使的。总之，南方代表们目睹了骚乱，轻易地相信：如果袁世凯离开北方，可能会发生动乱，从而危及新生的共和国。于是，他们不再坚持非要临时大总统到南京就任。

兵变发生的晚上，我正在朋友家吃饭。我的家眷像别人的一样已经被送到天津去了，在那灾难频仍的日子，人们不能不预先有所准备。席间，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我朋友的房子是一栋两层的西式楼房，对面是一个当铺，那里着起火来，遭到抢劫。我们上楼向外张望，看到东边和北边有数处火光，枪声时断时续。出外打听消息的仆人回来说确实发生了兵变。但是，几乎没有市民受伤和被杀，士兵们只是大声叫嚷，进行抢劫。惊慌失措的房主匆忙地把银子、元宝、细软等藏到床下或隐蔽的角落。但幸运的是，叛兵们没有光顾此处，尚无任何损失。据说总统官邸的卫队也参与了抢劫，有许多卡车载着抢劫来的东西，开进了外交部大楼所在的院子。

第一晚，叛军的行动只限于东城，但是到了第二晚，西城则被抢劫。那些第二天就匆忙逃到天津避难的人，不幸在那里也遇到了同样的骚扰。天津的叛兵比北京更加肆无忌惮，对居民的骚扰

尤为严重。这一系列兵变造成的恶果，很快影响到其他城市，实启军纪窳败之端。值得注意的是，兵变过程中，外国人并没有受到骚扰和抢劫。事实上，事发的两个晚上，有很多外国人悠闲地在街上散步，眼看着士兵们纵火抢劫。第二天晚上，我和朋友穿上西服冒险外出，街头空无一人（当晚西城遭抢），但未遇任何意外事件发生。

按照南方代表的提议，袁世凯得以在北京正式就职。

新内阁在3月30日组建，唐绍仪任国务总理，陆徵祥（时任驻俄公使）任外交总长。重要的行政部门如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和内务等部，均由袁世凯的老友、同僚出任总长，其他部门人选则来自南方革命党人。

陆徵祥推荐我为外交次长，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我的新上司与我是上海同乡，他的夫人是比利时人，擅长法语。他在外交界任职有年，曾担任过驻圣彼得堡公使馆参赞，后又任驻海牙公使。19世纪末两次代表中国参加海牙和平会议。革命的前一年，他返回北京与荷兰公使谈判设置领事的条约。就在那时，我与他熟识起来。

民国宣告成立后，所有的部门都重新命名、改组并使其现代化。一大批原来的官员被留用，特别是在外交部。因为这些被留用的外交人员不仅谙熟自己的职责、业务，而且深悉中国与列强间很多悬而未决的外交问题的来龙去脉。当然，一些满清旧式官僚被黜落，各部冗员也大为裁汰。办公时间也按照现代观念进行了调整。原来实行的免费膳食制度也取消了。因而，官厨的收入降低了不少。全部改组工作进行得异常迅速，当南京政府的人员抵京后，留给他们的位置已经不多了，这自然使他们很不满意。

我在担任外交次长时，经常被各种推荐信所烦扰。而陆徵祥和我都认为应该把一部分职位留给那些从驻外公使馆归来的有才能的人。我记得我曾向经验丰富并且足智多谋的内政总长诉苦，他大笑，说：“我的办法是在就职那天，安排好所有的职位。因此当朋友向我推荐谋职者时，就可以说：‘非常抱歉，实在是没有空缺了。’”

凭借丰富的外交经验，陆徵祥努力改变原外务部与外国使节打交道的方式。这些外国使节经常滥用特权，对他们的地位怀有特殊的优越感。而现在，如果某外国使节在会见中提出无关紧要的问题，陆总长会有礼貌地建议他们与主管司员洽谈。如果求见他的外宾过多，他会委婉地谢绝，并暗示他们可去拜访次长。他每年只接受各使馆一次宴请，这样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应酬，以免浪费时间。有些外国使节要求直接面见大总统以商量解决问题，全被他挡了驾。因而，使节们的这种习惯性作法渐渐地得到了纠正。

此后，在总长与外国使节的会谈中，不再有因争论激烈而拍桌子的现象，也见不到来访者面红耳赤，出言不逊的情景了。总之，外国使节受到礼遇和尊重，但是迎合乃至迁就、纵容他们的作法不再有了。应允应否，态度分明。处理交涉事宜更像商务谈判。交谈不再通过翻译，避免了双方对翻译的不满意和浪费时间。外国使节在不久以后也相当赞同这种方法，而且愈发敬重外交部及其属员。

当时，几乎所有的新任次长都比较年轻，而且大都曾留学欧美，于是我们很快就组织了一个聚餐会，每周聚会一次，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那时各部只有一名次长，后来才增加为两个。

陆徵祥先生的身体非常虚弱，经常请病假。他的许多职责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如果说中国当时的政界中有谁能认识到外交事务的举足轻重，那一定是袁世凯。列强通过他们的代表，对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发言权。而如果在别的国家，这些事情本属内政，当时国内重要的部门，如海关、邮政，均被外国雇员所控制，而铁路、沿海及内河航运、主要的银行业和工商业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至于租界、租借地、使馆区驻军、领事裁判权等，不是损害中国的主权就是使中国的国家机构陷于瘫痪，以致于我国的重要举措必须得到列强的认可和同意。由于巨额的赔款和外债使政府依靠的重要财政来源——海关税收已经枯竭，结果，年轻的民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要举借大笔外债，这使得我们又要重新仰列强鼻息。

因此，新总统袁世凯本人极其关注外交事务。他起床很早，常常在早上七点钟从办公室打电话召见我。他习惯在办公室独进早餐。由于他饭量很大，桌子上堆满了食物，仿佛把桌子都压得透不过气来。他总是邀请我与他一同进餐，除了米粥、咸菜和其他小菜外，还有鸡蛋、面条和河南大馒头，他的老家因这种大馒头而出名。进餐时及餐后，他向我提出许多问题，如部中某事如何处理，驻外使节关于各国对新政府态度的报告内容，有哪些职位尚空缺，需要任命新人。由于政府的更迭，很多驻外人员寄来辞呈或将要离职，他经常交给我一些准备好的名单，上面写有可任命为公使或重要领事官员的人选。

袁世凯对列强迟迟不承认他的新政权，很是担忧。在一次讨论外交事务的高层会议上，有人提到外国政府拖延对民国的承认，袁世凯怒气冲冲地说：“国内都有这么多人不赞成我，还指望什

么洋人！”当然，他是指国内的政敌。

袁世凯当选为总统后不久，孙中山特意从南方来拜访他。外交部大楼内为孙中山设立了行馆。袁世凯则搬到了陆军部。此时正值俄国煽动外蒙活佛阴谋独立的严峻时刻。而且，早在1911年11月9日，俄国就向中国、日本、英国和法国递送了它与所谓“蒙古政府”签订的条约文本，声称俄国承认蒙古自治，拒绝中国军队入驻和人民迁居于此，并正式确认俄国在外蒙的商务权利。实际上，此项条约完全因袭了几年前英国对中国的西藏的作法。

袁世凯意识到在这样的关头，中国无力抗拒俄国，于是倾向于与俄国谈判，以避免在北方与这个强大的邻国发生冲突，等待有利时机再作解决。当时的舆论都反对向俄国妥协，物议沸腾，因而袁氏决定利用孙中山在北京的机会，弄清他的态度。于是，我奉命前去拜访孙中山先生。孙氏强烈反对向俄国让步，他拒绝承认俄国有权干涉外蒙，主张不与俄国签署任何条约，并认为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当它强大起来后，把俄国人赶出库伦。总之，他认为，与俄国签署任何有关蒙古的条约，都将是伤害之外又加侮辱，不啻雪上加霜。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毫无疑问他代表了南方的意见。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得把事情搁置起来。直到1913年11月5日孙宝琦担任外交总长后，问题才得以解决。而梁如浩在1912年担任外交总长的几个月内和陆徵祥在1913年再次担任外交总长的时期内，与俄国的交涉一直都悬而未决。

梁如浩任职期间，我们对部里的房间做过一番检查。当我们来到一间废弃的外室，出人意料地发现了一些旧的文件档案。部员奉命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竟然发现了久已佚失的著名的《李—洛巴诺夫条约》(似为《中俄密约》——译者注)，不知这个文件为什

么会遗失在这里。梁如浩担任总长的时间很短,因为他不愿意在解决外蒙问题上违背孙中山和公众的意见,尽管他依然对他从前的上司、现在的总统忠诚无二。

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举借外债,以便结算革命期间南、北方的军事、行政的特别费用。先前与清政府签订了湖广铁路贷款合同的四国银行团表示愿意继续与民国商谈贷款事宜。然而,当时人们普遍对四国银行团持有怀疑,认为他们将强行提出苛刻条件,导致对中国的财政实行国际控制。而且,与他们进行的贷款谈判一定会拖得很长,解决不了当时的燃眉之急。况且,新政权此时还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这必然会加强四国银行团在谈判中的地位,使他们的态度更加强硬。因而唐绍仪先生在宣布组织新内阁之前,于3月16日就与华比银行签署了借款100万英镑的协议。唐氏此举引起了四国银行团的抗议,因为此前,前度支部的主事者^①已答应,在未来的大宗政治借款上将优先考虑四国银行团。而且,四国银行团已预先垫给度支部数百万两白银。唐绍仪的作法还引起了袁世凯周围人们的不快,他们十分不满这位新任总理权力的扩张。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谈判,四国银行团同意预支另一笔贷款,总数为1200万两白银,但合同的签订依然悬而未决。后来,中国政府与四国财团的谈判又出现了新的困难和误解,8月,谈判又停止了。直到1913年4月26日,唐绍仪内阁解散已近一年,才与四国银行团最终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

袁世凯与唐绍仪多年来关系密切。他们的友谊始于袁世凯任驻朝鲜商务总办期间,从那时起,两人成为挚友。袁氏一直把唐绍

^① 此处系指周自齐,1911年他曾任袁世凯内阁度支部大臣。——译者

仪当作他的左膀右臂,特别是在处理与外交有关的事务时。他们两人都具有超凡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跻身于政界最高层。在意见相左时,两人谁也不肯让步,因此,冲突迟早会发生。也许袁世凯是受到了他周围人的影响,后来他对唐绍仪的忠诚产生了无端的怀疑。而唐绍仪对南方的明显同情和对民主原则的不加掩饰的赞美,也相当不合袁世凯的口味。唐绍仪组阁后,在第一次与总统的正式会见中,他在介绍内阁成员的同时,向总统提醒道:按照《临时约法》,内阁只对参议院负责。总统的回答却是典型的官场腔调:“我们都是老朋友,我相信我们总是一致的。”当时在场的一位部长把这番谈话告诉给我,并预见到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发生,因为两人的观念完全不同。

可是,唐绍仪的朋友们却是这样解释他当时的政治态度:由于认识到代表北方的袁世凯与南方激进共和派的争执一触即发,唐绍仪一则想发挥连接南北方的桥梁作用,一则想为袁世凯充当缓冲器,使袁不致于成为攻击的靶子。他既因与南、北方都有着友谊关系而自豪,也因深刻了解双方而充满希望,于是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却注定了要失败,因为南、北两极相距太远,是无法用桥梁连接的。唐绍仪与孙中山都是广东人,仅从这一点考虑,袁世凯就不会太信任他的总理。

唐绍仪与袁世凯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在直隶都督人选问题上的分歧。由于北京位于直隶省,直隶都督权重位尊,他掌握着国门通道。当时,直隶人士和省议会都赞成王芝祥将军任此职。王氏系直隶人,但他是南方共和派的支持者,且从来未在袁世凯麾下任过职,因而,不为袁氏所信任。最后,袁世凯以直隶有军人反对王氏为借口,改派他前往南京办理遣散民军的事情。唐绍仪拒

绝副署此项派遣，袁世凯一意孤行，仍旧把未经内阁副总理副署的派遣令发给王氏。

在当时的情况下，唐绍仪别无选择，惟有坚持《临时约法》规定的权力，他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那里提交了辞职书。5月27日，袁世凯批准了他的辞呈。两天后，外交总长陆徵祥被任命为代理总理。

南方的全体内阁成员也同唐绍仪一并辞职。内阁的空缺由周自齐（财政总长）、朱启钤（交通总长）、范源濂（教育总长）等人填补。这些人多属袁氏故旧。后来，为了拉拢南方，又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办，黄兴为粤汉川铁路督办。

与此同时，四国银行团吸收俄国和日本为成员，扩大为六国银行团，但是他们依然无意向中国预支款项解决财政急需，除非中国接受他们的苛刻条件。正在这时，我国驻伦敦公使代表政府签署了克里斯普（Crisp）100万英镑贷款合同。这项合同的公布引起了轰动，它表明中国依然有能力主要按照自己的条件取得贷款，而没有必要非仰赖六国银行团。

由于健康原因，陆徵祥担任总理没多久，便于9月辞职了。旧派官僚、原内政总长赵秉钧继任内阁总理，梁如浩接任外交总长。后来，梁如浩因未能解决蒙古问题，突然离职前往天津。如前文所提到的，梁氏认为与沙俄签订有关外蒙条约，违背民意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陆徵祥又再次被任命为外交总长。虽然外交总长替换频繁，但我一直担任外交次长。尽管工作繁重艰巨，我却因此获得了丰富的经验。陆徵祥是当时中国外交界的资深官员，声望很高。但是，衰弱的身体使他无法承担更重的工作。他办事一丝不苟，尤重礼仪。他吸收了丰富的欧洲文化知识，为人正派。他对袁世凯

极其尊崇，即使在由他掌管、而且颇为熟谙的外交事务上，他也惟袁氏马首是瞻。

陆徵祥十分欣赏我，常常不厌其烦给我讲人生哲学。他认为人只有在经济上独立，才能忠于自己的信仰；如果为衣食计，就会抛弃信念。他知道我以工资收入为生，便建议我担任驻外使节，这样可以渐有积蓄。当时驻柏林公使的职位尚空缺，他便向总统推荐我担任这个职务，同时兼任驻瑞典和丹麦公使。

1913年春，我携同妻子以及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与两位秘书取道西伯利亚前往任所。而此时，新的中国政府尚没有被德国及其它列强所承认。